

启蒙与革命

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鹅湖学术丛书

江右学术，推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乾、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駟、壁立万仞之势，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迨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绩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亲约朱、陆等会于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鹅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为中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鹅湖书院志》



张宝明 / 著

■ 鹅湖学术丛书

启蒙与

革命

——五四「激进派」
的两难

我选择这么一个历史现象去做，
根本着眼点并非为『过去』而『过去』，
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并通过
再现过去来映照未来的生活图景。
在中国现代化问题愈来愈受关注的
今天，从五四「激进派」的「启蒙」
与「革命」之间的两难这一独特角
度审视五四思想史的来龙去脉，必
能在死亡的历史废墟上营造一方生
命的绿洲。这，正是社会史「再现
过去」的意义所在。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张宝明著.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9. 3

(鹅湖学术丛书)

ISBN 978-7-5392-5138-7

I. 启… II. 张… III. ①陈独秀(1880~1942)—思想
评论②李大钊(1889~1927)—思想评论③胡适(1891~
1962)—思想评论④鲁迅(1881~1936)—思想评论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2563 号

启蒙与革命
——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QIMENG YU GEMING

张宝明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960 毫米×68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190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5138-7 定价: 42.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江右学术，椎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乾、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駟、壁立万仞之势，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适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赅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1175），亲约朱、陆等会于铅山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鹅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鹅湖书院志》

在学术图书出版叠床架屋之今日，要为自己操持的一套深度原创性学术专著取一个满意的丛书名称，着实费了我们几个愚钝的编书匠不少心思。某秋日，陪学界同道至铅山鹅湖书院寻踪朝圣，于习习秋风中目睹“斯文宗主”、“圣域贤关”诸多旧墨遗痕，不

禁感怀寄意，遥念起八百余年前极一时之盛的“鹅湖之会”，朱、陆辩难论诘之情形，依旧令人景行行止，温情与敬意填塞胸臆。蓦然间我们发觉：还有什么比用“鹅湖”来命名它更为合适的了？！

朱、陆所生活之宋代，乃中国文化之重要转折期与特出鼎盛期。陈寅恪先生曾推许：“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作为宋代文化中心之一的江西，时人亦多有“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之美誉。在此时空交结点上出现的鹅湖学术盛会，并非横空出世之偶然事件，而实崭露出一个思想活跃、诸说并起之学术繁兴时代，昭示着一处文化中心区域人文蔚郁、群星璀璨之阔大气象。作为一家地方出版社，我们从不以地域自囿，从不因地处边缘自惭，而一向努力追求胸怀中华文心学脉、放眼天下学术图景以尽当代出版人一己之学术文化担当；况且沾溉于如此悠远之地域文化资源，沐浴于千年不绝之流风遗韵，我们无法不油然对这份赐福深怀感激，并常萌生将其继往开来、光大发扬之念想。“鹅湖学术丛书”之所以能够问世，与这种历史深处的人文底蕴时时在催促着我们戮力勤勉是分不开的。

要进一步说，我们坦言，以“鹅湖”为一学术丛书命名，还有深意存焉。在今天的各类辞典及史论著述里，“鹅湖之会”被简单地定义为朱熹之客观唯心主义与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之争。事实上，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内容与精神，远比历史的描述与记录丰富、深远得多。朱陆之异，首在为学工夫。朱熹指陆九渊的“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是近于禅学，所谓“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而主张以“道问学”为重；而陆九渊则责朱熹的“即物穷理”是“留情传注”、“增疣益赘”，所谓“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而力辩以“尊德性”为先。这种学术分野，与当代学界近年的“思想”与“学术”之争，颇有异代同调、契合暗通之处，堪引以廓清今日之喧嚣与迷茫。鹅湖数日，朱陆双方细参异同，各抒己见，反复讲论，

但最终彼此存异,不合而罢。此后两家门人,各有所宗且互竞争雄,恰如两水分流,双峰并峙,在思想史上流衍、弘大为程朱与陆王二大学派。而双方于此颇颇互异之中,又不乏同情理解之心:朱熹晚年颇悔其支离训诂之失,而陆子不久亦有自责“粗心浮气”之语。所谓学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而又有克己之勇与服善之诚,此诚学人戒偏戒执之至道和现代学术精神之首端要义,与当代学人所谓“于己理论彻底而于人学术宽容”一说,不亦有精神相通之处乎?至于其他,如古代士子问道游艺四方的良好风习、于民间书院中接“学术地气”而使个体元气酣畅之追求、讨论天理心性之类形而上问题所体现出的自由与想象、学术对手相互切磋砥砺的进学之道、“志同道合,极论无猜,降心从善”的学术胸襟等等,凡此“鹅湖之会”中所荷载之种种,皆为值得我们今天弘扬推重之优秀学术传统。由其光大的古代学术会讲制度,在近现代发展为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成为推动学术与时俱进的重要方式与动力。但其中至为重要者乃在于,“鹅湖之会”所蕴涵的学术精神,无疑有望成为促进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历史资源与一剂针石良药。质言之,“鹅湖之会”之所以被定格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会和一段流传千古的士林佳话,并非因为其所具论百世不易,而乃因其藉争鸣以激荡思想、繁荣学术之优良传统为百世不可易者。逝者如斯——“鹅湖之会”早已超越了其具体论题,而逐渐凸显出其象征之意义:它所孕育的良好学术机制和所倡导的自由学术空气,在当代学术发展中日益体现出其不可或缺之重要性。拒斥异见,则必流于武断塞蔽,终使学术枯萎衰竭;众说争鸣,有望走向宽容多元,终使学术健康昌明。这一事关学术发展的“元问题”,与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学术规范问题、学术创新问题、学术机制问题、学术“本土化”问题、“中国话语”问题等等,在时下复杂的学术语境中有着一种发人警省、促人深思之历史—现

实关联性。所谓“赋新思于旧事”，“鹅湖学术丛书”接续于历史久远厚重的人文传统，而着眼于现实坚韧有力的学术建设，并深深期许于未来别开新局之文化前景。作为当代出版人，此等高远标杆，虽或有不能至者，但始终心向往之。

近十年以降，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思想学术的“引进—模仿”色彩逐渐淡出，而“创造—参与”之追求日益凸显。历80年代之激越蹈厉、90年代之沉潜蕴积并经跨世纪苍茫心绪之过滤淘洗，中国学术正借全社会创新之主旋律而深入精进。新世纪清明宽阔的学术舞台，正期待着当代学术中坚勇毅担当、践履自任。“鹅湖学术丛书”试图在此推波助澜，激荡风气，以促成新世纪中华学术之“预流”。在这个大的出版宗旨之下，我们并不想从学科内容上为丛书划定绝对明显的范围——如果一定要说有所限制，那我们想可以概括为偏重于人文而扩大至整个社会科学；而从特质上说则不妨特意提出学术原创、中国话语、问题意识“三原则”，以此有别于充斥坊间之整理汇编类图书、简单译介类图书等，超越于重复堆垛而毫无新创之泡沫学术。

上承八百年前“鹅湖之会”学术民主之精神，适逢中国学术迈向繁荣新创之盛世，“鹅湖学术丛书”贯通历史当今，占尽天时地利，吾等编辑于此深感大幸，同时更觉有重责。志在学术之心意殷切，而常恨个人力气之绵薄，深恐有负士林学界之厚望，由此尤望天下学人同道乐于成人和之美，秉为学当有益于天下之公心，共襄此旨在提升中国当代学术人文境界之善举，庶几可望构筑一当代学术之“公共空间”。

聊作以上赘语，以为启动“鹅湖学术丛书”之开场锣鼓。

国功 景琳

二〇〇一年五月

代 序

1992 春,在经济热潮从南方铺卷而来的当口,我进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那是一个质疑“教授值多少钱一斤”时代,也是一个“历史系是否还能存在下去”的时代。正是在人文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关口,思想界迸发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1993 年,《东方》杂志创刊。在今天看来,那是一本具有转型意义的杂志,它的创刊极具象征意义。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理想和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怎样正视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将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难话题。这也正是思想史上以不同变形频频出现的思想史命题。因此,选择这么一个命题去做,本身就是一次思想的挑战。笔者深知,这是思想史上司空见惯但又常以各种变形频频呈现的吊诡。

的确,如同高速公路的转弯处一样,思想史上的事故多发一般都是处于政治、经济、文化诸种社会因素的加速转型期。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经济砝码是一次地地道道的转型,这种转型在知识分子中的表现主要是心态的失衡及其调整。当然,政治往往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一般的社会转型也都不会是单向度的,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程度之变化。或许是 20 世纪最后十年的社会症候触动了我,或许是 20 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心灵启发了

我,《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的论文选题就落在了我的名下。十分巧合的是,自从我进入南京大学的那一刻起,我的导师就鼓励我选择五四激进派作为学术志业。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也一直拿我的未成形的博士论文关键词“两难”发点时的感喟:“真是张宝明说的那样,两难!”

我心里很清楚,包括像我导师蔡少卿先生这样有着深厚学术素养的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也难免经历着这样或那样的两难。“五四”一代包括“五四”前后几代的知识分子曾经经历过的,我们这些后来者也正在经历着或说承受着。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时代转型时期活生生的晴雨表。虽然这没有“TO be or not to be”来得直接,但我自己已经感受到:它有着“是生存还是死亡”一般的真切和深切。这也是李良玉这样一位心高气傲的思想史家在阅读了我的论文初稿后何以那样感同身受的认可的原因。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适逢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教授以及他的博士生一起来南京访问,德里克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写作范式由“革命”到“现代性”转型的反思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后来,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有能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在此我还是要感谢他的启发,当然更要感谢蔡少卿、茅家琦、张宪文、崔志清、魏知信、徐梁伯、万仁元等教授以及李良玉先生给予我的肯定和鼓励。

1998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本书时,那是大陆学术界转型时期第一本研究五四激进派的专著。光阴荏苒,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当年触摸历史人物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所以尽管今天看来这本小册子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同样是处于“历史”的原因,我更愿意“立此存照”,将那一特定时期的困惑、迷茫与挣扎“完整”流布。如同我愿意将五四激进派作为中国现代性演进的一个历史注脚一样(这我在结语中曾经述说过),这里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和我的思想史研究对象一起打包,为21世纪的思想史研究提供双重的注脚。这也是本人在征求编辑先生的意见后,除却写下一个再版序

言而不动任何“干戈”的一个根本原因。

1993年,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进入到了着手阶段。《东方》杂志创刊号上的四篇文章赫然映现在封面上:刘东的《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陈平原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陈来的《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杨东平的《现代中国的〈双城记〉》。尤其是二陈的文章更是切中时代脉搏、撩人心扉。以陈平原先生的文章之开头和结尾的两小段文字为例,它颇能映射一代学人的心态:

“人文学者”并非荣誉称号,只是一种职业选择;因此,已经“为宦”或“下海”的“前学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不涉及教授卖馅饼、倒汽车或者进政协朝政之类的热门话题,而是思考愿意并仍在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的命运及其可能的选择——因后者更多困惑与迷惘,更值得理解与同情。讲“命运”及“选择”,在纵论“天下大势”时,不免渗进一己之体验,且注重现实对策而不是理论分析。这种带“可行性论证”色彩的思考,某种意义上是在为文化转型期的人文学者重新定位。

人文学者的命运如此受关注,而且需要“重新定位”。这几乎和当年失去科举这一条“独木桥”时的状态没有什么两样,知识分子有一种进退失据的两难。就是在陈平原写那篇文章的当口,大学教授的薪水大约相当于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人文学者的被边缘化到了令其瞠目结舌、胆战心惊的地步,于是不能不开始认真地反思和重新定位,而且需要再来一次“我是谁”的追问。斯文扫地的寒士重新出现了“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感叹,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但受到他人的怀疑,最可悲的是这个价值受到了他们自身的怀疑和拷问。这也是陈文在最后一个部分以“重建学术自信”为题给学术界开处方的原因。最后,作者为同人描绘出

了这样一个可供选择的选择：“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之中，作者还守护着最后的底线。这从作者对于“三句大白话”的脚注中不难窥见其人文的坚挺性：“关于雅俗文化之间的对峙与转化，是笔者近年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基本立场是理解通俗文化，坚持精英文化。之所以郑重提及，是因为国内有些朋友一提‘民间社会’（指‘民间社会’），继承滑向‘民间文化’，再一转就几乎成了‘大众文化’。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①在拷问中无奈，在无奈中坚守，在坚守中转型，人文知识分子正在经受新一轮的两难。

应该说，这是我当初以“两难”作为关键词考察五四激进派的基本思想文化背景。与此同时，我毕竟是以激进派作为研究对象的，而且对他们当年追求的理想和担当、光荣和梦想有着一种自然的历史亲和性。在知识分子要起学术深沉的时代，究竟如何评价五四一代人所做的工作再次成为一次全新的学术挑战。这不但是挑战思想史上的学术界，更是挑战我自己。毕竟，在没有说服自己之前，任何创见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是在《东方》杂志的创刊号上，陈来的一篇名为《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的一篇文章把我要谈论的命题推向了极致。这篇文章既包括了对“五四”的反省，也有对“戊戌”的非难。在当时国内思想氛围十分消沉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出台无疑给极其困惑的我“雪上加霜”。同是在那篇论文里，诸如“退而结网”、“向内转”、“比慢”的深沉提法开始被我关注。以下两段话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片段：

当然，20 世纪知识分子确实面临着困境，一方面，民主的

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超前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文化批判与其他批判的纠缠又无法真正避免。在最近的一次文化运动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始终把学术和文化工作看成工具性的,借学术或文化的名义达成政治目的,以文化批判当做政治批判,这是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根源。由于这些学者从政治需要出发评论文化问题,对文化的分析不可能依照文化发展的内在价值和理路加以评判。其典型的提法是把儒家当做专制体制的意识形态,以为彻底打破儒家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把儒家思想作为一切现实问题不得解决之根源加以批判,其毛病与五四批判家是一致的。

将“五四”的激进主义说成是一个“毛病”,而且在最后借用一位海外知识分子的评论确认并强调说:“十年前,余英时先生在《论中国文化的重建》一文中,针对近代以来的过激思想,五四以来以政治为第一义而不严守学术岗位的风气和心态,面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民主素养和近代中国政治素质普遍低落的现实,明确指出其重要原因是学术衰微,提出应‘退而结网’,把注意力从政治的领域转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强调不在学术思想方面发生建设性的根本变化是不可能促进中国变革和进步的。文中所说,在今天看来,仍切中时弊。今天,客观情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转向的机会,但要看知识分子肯不肯坚守学术阵地,为文化运动的再出发打下稳固的基础。”^②“十年前”就有的观点到了十年后才去重复,而且说“客观情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转向的机会,大有欢欣鼓舞之情。一时间,大陆知识分子将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海外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奉为圭臬,这一类的检讨激进主义的著作在当时也是一时纸贵。

不难看出,我是在人文学者命运危机四伏与保守主义行情见

涨的双重历史坐标中来审视五四激进派之来龙去脉的。那时,不但有张灏的《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的反思,更有林毓生将“文革”与“五四”同日而语的历史溯源。^③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上发生的那场余英时和姜义华的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证余音未断,^④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的论调则如日中天。^⑤我在南京大学参与的一次学术对话也正应验了大陆学术界的思想气候。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思想的淡出。当80年代末思想的风波消失在云围之中后,一时间对20世纪激进主义的检讨成为一种时尚。固然,这种时尚的形成也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发现,仍是海外来风吹拂的结果。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场由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教授主持的讨论是由我率先提问的。问题是对美国学者所讲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每一次运动中都充当了不好的角色”。对于从事五四激进派研究的学者而言,我无法按捺自己的心情。更何况这个判断的确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于是,下面的情形发生了:“我这里讲的一个观点可能不会为中国,尤其是大陆的分子所接受。”“既然您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每一次运动中都充当了不好的角色,起到了不良的作用,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应该如何是好呢?”这就是说他们应怎样为自己定位呢?这位教授十分严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遗憾的是,她没有,也不可能给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答案。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对中国激进主义批评的观点。不错,是很新鲜。但是,我无法接受。

一个历史转型的关口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思想史上的表现就是一些精神现象纷纷走上前台。《读书》上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东方》上的“告别革命”的畅谈,《二十一世纪》上的“激进与保守”的论争,这一切精神事件的发生似乎在表明,在经济转型的同时,文化界也在力求要将20世纪这最后一页尽快掀过

去。那是一个潜伏着读书无用的经济时代。“十亿人民八亿商，还有两亿待开张”就是那个时代的形象表述。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上的那篇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曾撩拨了我那敏感的神经末梢。这也就是我在当年出版“后记”中曾经描述的那样：“博士毕业后的两年，我曾为糊口做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正如我后来所感觉到的那样：当那些在书斋尚未“下海”知识分子在嘲弄暴发户“穷得只剩下钱”的时候，也只能做“我富得只剩下文”的自我安慰状。

我渐渐发现，在诸如这类观点在报刊上已经连篇累牍，贬低激进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时尚时，选择五四激进派这一命题作为博士论文太沉重了。毋庸讳言，有一段时间，我针对自己的选题本身一度两难：一方面是割舍不断的五四情怀，另一方面又的确看到了“五四”的软肋。

《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完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一直认为这句话更适合思想史的学科。同时，我坚信思想史就是心灵史：既是对研究对象的映照，也是研究者自身心灵的投影。研究者这一主体和历史客体（那一时代的特定主体）构成的互动凝聚成了思想史的心灵大厦。这也是笔者一再强调的：与其说是在研究历史，毋宁说是在说你、说我、说他。我在初版前言里曾经述说自己是“在死亡的历史废墟上营造生命的绿洲”，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历史是死亡的、固化的、常态的东西，而作为历史继承者则是鲜活的生命个体。历史本身没有意义，看你怎样赋予他意义；废墟没有生命，关键在于我们赠予它何种灵光；“过去”已经过去，我们是否还能在打捞“过去”的同时，再造时代的辉煌。

我得承认，道德理想主义之乌托邦政治情怀并不是应有的依托。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理想主义的情怀又是在野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这也是笔者一直信奉这样一个思想史逻辑的依

据所在：在朝的激进主义容易事故多发，而在野的激进主义不但不可怕，相反倒是一种与守成者保持必要张力的合理存在。如果说对“五四”的情怀有什么依恋的话，那就是她的理想主义。对此，笔者在本论再版之际还是想借用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为王中江先生和笔者共同主编的《回眸〈新青年〉》序言中的一段话诠释我们共同的情怀：

中国已回到市场经济的路子上来。社会富裕、物质生活大幅改善，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但在一条鞭地追求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失去很多。不要说一般大众，即使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也已快被经济大所淹没。大家的生活只顾今天，不顾明天；只顾现实，不重理想。就当前迫切要求的社会改革、文化更新这两大目标而言，知识分子丧失理想，实是严重的危机。理由很简单，不论是了解问题或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具有智慧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必定富有理想主义的精神。自古至今，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要求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由它激发出来的奉献热忱，永远是最大的资源与动力。回看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对我们能没有一点感应和启示吗？^①

在对高调理想冷静反思的 21 世纪，身处边缘的知识分子还有重审理想主义的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正是这点理想主义的情怀陪伴我们走过了 20 世纪。也正是在这种情怀中，我的《启蒙与革命》在具有人文理想之情怀的江西教育出版社同人的青睐中得以再版。在感谢蔡少卿、李良玉教授的同时，我还要感谢当年约我杀青稿件的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学林出版社的曹维劲先生。当下我更要向张国功、熊侃先生致意，是他们的具体努力使得那一时期的思想症候和精神坐标得以重现。我深信：作为作者心灵映

射的历史投影价值超过了研究本身的价值。这,也是笔者同意再版并为之欣喜的理由!尤其是正值“五四”九十周年大祭的历史当口!

注释:

①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东方》创刊号,1993年。

②陈来:《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创刊号,1993年。

③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本。

④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之后《二十一世纪》还发表了有关这个命题的一系列争鸣文章。

⑤参见张宝明、王中江《回眸〈新青年〉》序二,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目 录

编辑人语	(1)
代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文化与政治的歧路	(6)
第一节 共识:由立人而立国	(8)
一、“立人”的逻辑构成	(9)
二、近代以降的历史传承	(13)
三、时代的选择与超越	(17)
第二节 歧义:两股思想潜流	(22)
一、“不谈政治”的悖论	(23)
二、文学的“改良”与“革命”战争	(26)
三、“人之两种导向”	(30)
第三节 分化:渐进与革命	(35)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	(35)